

近代日本中國哲學的誕生 ——以明治一〇年代在東京大學的 課程為中心

佐藤將之*

摘 要

本文是為了闡明目前學界所稱呼「中國哲學」或「東洋哲學」的學術領域在明治時期的日本如何誕生、如何形成之一番試論。所謂「中國哲學」這樣學術領域是以「哲學」這樣的概念和學科之引進為契機而形成，並且此契機的磁石場是當時剛創立的東京大學。本文經過其創立時期教授與中國哲學相關內容的課程之費諾羅薩（Ernest F. Fenollosa）、井上哲次郎以及島田重禮三位的上課內容之分析，勾勒出江戶時代以來經學或儒學的思想內容由「哲學」的分析框架來獲得新的思想涵義之過程。如此，在德川時代原來被視為經學上的內容逐漸轉換成「人格修養」、「國民道德」等具備近代特質的倫理主張。孔孟等經學上的聖人以及戰國諸子也皆變成了「哲學家」。

關鍵詞：中國哲學、東洋哲學、明治思想、東京大學、井上哲次郎

* 佐藤將之，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投稿：110年5月12日；修訂：110年8月20日；接受刊登：110年10月11日。

The Birth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Meiji Japan: A Study of Some Seminars about Oriental Philosophy at Tokyo University during 1880s

Masayuki Sato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lucidate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r “Oriental philosophy” as an academic field which took form during the Meiji Era of Japan. The academic field called “Chinese philosophy” originated mainly from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philosophy into Tokyo University during the 1870s. The main scholars who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is scholarly field were Ernest Fenollosa, Inoue Tetsujirō, and Shimada Chōrei. Fenollosa was the first teacher who taught the contents of Chinese thought from the viewpoint of philosophy. Inoue Tetsujirō was also the first instructor who took charge of the seminar under the title of “Oriental philosophy” in which he compared the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those early Chinese thinkers with those of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Shimada, succeeding Inoue, was another pioneer because he first taught the whol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from the ancient to the Manchurian period, though Shimada himself had not received philosophy education in his youth. Their seminars have strengthened the philosophical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m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ers, and as a result, those thinkers have been all considered to be “philosophers” by the time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t was by this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thought,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that the contents of Confucian canonical studies of the Tokugawa period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new ideological ground for advocating the necessity of self-cultivation and so-called “national morality” in the following Taishō and Shōwa periods.

Key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Oriental Philosophy, Meiji Thought, Tokyo University, Inoue Tetsujirō

近代日本中國哲學的誕生 ——以明治一〇年代在東京大學的 課程為中心

佐藤將之

壹、序論

本文是為了闡明目前學界所稱呼「中國哲學」或「東洋哲學」的學術領域在明治時期如何誕生、如何形成之一番試論。雖然聽起來令人意外，過去日本的中國思想・哲學研究似乎一直並沒有注意過將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在明治時代的情形放在視野裡而探討此一展開的問題。根據筆者的管見，針對此題目某種程度完成論述的只有赤塚忠（1913-1983）和坂出祥伸（1934-2020）兩位的研究。¹然而就此兩人對明治時期情形的論述均僅僅只有幾頁份量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此主題的興趣反而在日本之外的學者群中逐漸提升的事實。在稍早的 1993 年中國大陸的學者徐水生出版的《中國古代哲學與日本近代文化》，正如其書名般，開始注視在日本思想的近代化中「中國（古代）哲學」之角色。²在同一年，當時為東京大學的研究生而

¹ 見赤塚忠（1968）、坂出祥伸（1994）。

² 請參閱徐水生（1993）。此書原為武漢大學的博士論文，後來翻譯成日文於 2008 年出版。請

目前在日本弘前大學擔任教授的李梁也發表了「近代日本中國學的政治和學術——服部宇之吉與近代中國學」的研究報告書。³

從此之後大約十五年之 2007 年，由深圳大學景海峰所主編《拾薪集：「中國哲學」建構的當代反思與未來前瞻》的論文集出版，該論文集收錄了梅約翰（John Makeham）的〈明治學術資源、論理學與中國哲學的雛形〉和石百睿（Barry D. Steben）的〈早期現代東亞學術裡的東西哲學交織與「中國哲學」的誕生〉等兩篇論文。此兩篇論考均探討在明治時代日本「中國哲學誕生」的相關問題。⁴不但如此，到了 2010 年由當時在廣州中山大學的桑兵（現在服務於浙江大學）也發表了〈近代「中國哲學」發源〉一文⁵，該文也翻譯成日語在 2013 年以〈近代『中國哲學』の起源〉的篇名在狹間直樹、石川禎浩共同編輯的《近代東亞翻譯概念之展開》中出版。⁶到了最近，也有陳威璿的〈中國哲學史通史寫作的發展——從中日交流的視角談起〉乙篇。⁷曹峰則受到李慶和藤井倫明的啟發而出版了〈對內田周平的重新認識〉的論考，在曹峰主張內田周平（1854-1944）是在近代日本出版第一本「中國哲學史」的學者。⁸另外，若我們注意以下幾年與此相關題目的學位論文提出的動向，雖然大

參閱徐水生（2008）。然而，徐水生因為將「中國哲學」與「漢學」、「儒學」視為相同，所以在沒有明確自覺下，就判定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就是「中國哲學」。如此，徐先生比較缺乏明治時期實為「中國哲學」學術領域的形成時期之觀點。

³ 李梁（1993）。

⁴ 梅約翰（2007）；石百睿（2007）。雖然從漢學史的觀點，該論文集也載錄陳瑋芬（2007）〈由東京大學「漢學」相關學科的建立和變遷看近代日本的學術轉型〉乙文。

⁵ 桑兵（2010）。

⁶ 桑兵（2013）。

⁷ 陳威璿（2017）。

⁸ 曹峰（2016）。關於內田周平的評估，曹峰受啟發的著作是如下兩筆：李慶（2010）、藤井倫明（2011）。不過關於內田周平是否正如曹峰等所主張，是一位出版日本第一本「中國哲學史」的學者，請看後文。

部分還沒有正式出版，但最近幾年期間也有幾篇含有關於明治時代「中國哲學」學術形成相關議題的博士論文。⁹

在如上所舉的論考中，比較接近於筆者問題意識的是：梅約翰、石百睿、桑兵以及陳威璿的論考。雖然梅約翰、石百睿、陳威璿三位的論考都的確意識到日本「中國哲學」這個學術領域的形成是在日本近代引進「西方哲學」的事實上，但針對明治時期（尤其是其中在明治 10 年代和 20 年代的學者，如井上哲次郎和井上圓了等人，後詳述）的「中國哲學」的議論內容，卻幾乎沒有進行具體的探討。與此相比，在桑兵的論文中我們則能夠明確觀察出他努力勾勒出在明治時代「西方哲學」的引進如何促成「中國哲學」這樣學術領域的問題。然而正如桑兵本人承認，目前在明治時代有關這樣方面的具體資料相當的不足。¹⁰因此與如上三位同樣，我們還是無法從桑文獲悉在明治時代中期，與中國哲學相關的議題由何種學者經過何種論述而提出的實際情況。

鑑於如上相關研究的情形，本文則以「中國哲學」這樣學術領域在明治時代由「哲學」這樣的概念的引進為契機而形成的觀點出發，先點出為了研究明治時期思想時有意無意都會碰到的方法上問題和在研究視野上所需要克服的諸點，然後將具體分析在明治時期日本「中國哲學」或「東洋哲學」這樣的學術領域形成的過程。

至於日本近代社會如何接受「philosophy」概念，以及在當時日本知識分子如何認知「philosophy」的涵義之問題，許多學者曾經由不同的角

⁹ 筆者所獲悉的為如下：吳鵬（2011）、胡珍子（2015）、水野博太（2020）、胡穎芝（2021）。關於胡穎芝的博士論文，若我們只看題目（《漱石の「向う側」から晩年の「則天去私」へ：東洋思想との關わりを中心に》），似乎與本文探討內容並不相關，但其中包含「漱石與『東洋哲學』」的重要一節，而在此作者詳細分析夏目漱石上過井上哲次郎「比較宗教及東洋哲學」的課程，並為此提出以「老子の哲學」的期末報告。胡穎芝也分析夏目漱石該報告的內容。

¹⁰ 桑兵在出版該文的當時似乎還未知悉本文所引述的費諾羅薩（Fenollosa）、井上哲次郎、島田重禮等的講義筆記本的存在。

度進行研究。而在進入本論之前，關於此問題就筆者欲表示的論述之立足點，其要點可以歸納於如下三點：首先，關於在德川時期到明治時期「philosophy」一詞如何翻譯成日語的問題¹¹，主要由兩方面的議題來展開：（1）作為「philosophy」之翻譯詞的「哲學」和「理學」兩詞之使用情況的展開以及最後「哲學」壓倒「理學」的過程。（2）井上哲次郎所編輯的《哲學字彙》相關的議題。¹²

第二，相形之下，針對在如何翻譯「philosophy」概念背後的思想問題，亦即針對如何將此概念落實於東亞知識傳統的問題，近年由如 John C. Maraldo 等學者努力釐清。Maraldo 的研究觀察出，明治初期的日本知識分子實為無法理解「philosophy」的正確涵義，而在此時只好在傳統思想資源中聯想「philosophy」的內容。Maraldo 據此進一步推論說，這也是在創立期的東京大學的「philosophy」科只能主要使用英文講授「philosophy」相關課程的情況。¹³

第三，與如上所述重視語言層面的問題相比，筆者在本文則要提出的論點是，與其探討明治知識分子如何理解「philosophy／哲學／理學」概念本身，不如關注井上哲次郎和他的後輩青年知識分子們在經歷過已經設立的「哲學科」中學習已被稱為「哲學」的「philosophy」之事實。既然井上哲次郎等人進入東京大學的時候，東方思想的內容已經開始以「支那哲學」和「印度哲學」的名稱而開始授課，此情況讓他們對「哲學」和東亞傳統思想之間關係帶來兩方面的影響。（1）井上哲次郎等人在構想整體東亞思想的內容時已有某種程度由「哲學」概念來思考此項

¹¹ 關於「philosophy」一詞的翻譯字的展開情況本身，遠藤智夫的非常仔細之研究頗有參考價值。請參見遠藤智夫（1993）。

¹² 筆者曾經探討過井上哲次郎《哲學字彙》對日本的中國思想研究發展上的關鍵角色。請參看佐藤將之（2016）。

¹³ 請參閱ジョン・マラルド（John C. Maraldo）著，白井雅人譯（2014）。

問題的思維傾向。(2)再說，由於他們有關「philosophy」的知識是在近代大學的學科制度中學習而來的，其理解的程度與從特定的人或著作學習「philosophy」的明治初期啟蒙知識分子相比具備相當系統且多樣。換言之，他們在屬於「哲學」學科中的主題，如「純正哲學(形上學)」、「倫理學」、「知識論」、「邏輯」等之中，可以選取與東亞思想傳統能夠會通的地方。

基於如上情況的考量，筆者所要關注的是，在當時東京大學進行的課程內容以及畢業的學者們之相關著書中如何探討我們現在所觀察的「中國哲學」相關議題之實際情形。在本文的最後部分，作為引進「哲學」這樣的分析工具來進行考察的具體例子，筆者將觀察明治知識分子在「哲學」視野中如何開始關注「性」概念和「孔子」相關議題之情況。

總之，筆者希望本文能夠論證：在明治時期當時，表面上似為衰退的傳統之經學和儒學，經過「哲學」這樣學科的形成，實為得以重新構築。換言之，經學和儒學的思想內容以及價值體系，以其「哲學化」過程為主要契機，是開始於明治末期到大正時期所展開「人格修養」、「國民道德」等似乎具備「近代特質」的主張中不可或缺之思想資源。

貳、過去明治思想研究的兩個問題

那麼，為什麼在日本國內如本文所要探討的「明治時期日本的中國哲學學術領域的誕生」這樣的題目並沒有吸引日本學界呢？倘若我們考慮這項題目同時也屬於明治思想史或明治哲學史，其中一個原因或許與在日本學界對明治思想研究本身所內含的問題相關。於是筆者在進入本論之前，將由比我們所欲探討的「中國哲學的誕生」這樣的題目再放開一點的視野，來思考日本明治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首先，我們可以指出的是，在過往近代日本思想研究的累積上，對西田幾多郎（1870-1945）以降所謂「京都學派」的比重過多。不過與本論文的問題意識直接關聯的問題是，在過去針對明治時期本身的思想研究中，絕大多數的研究成果集中於如福澤諭吉（1835-1901）為首的屬於明治初期啟蒙知識人的思想之研究。相形之下，學界針對明治 10-30 年代情況的興趣卻不高。然而，其實在此時段才是日本的國家和社會正在屬於「哲學」這樣的學術訓練（discipline）引進於大學教育機制，並且一步步得以落實的過程。因此，若我們要釐清日本近代思想史中如何引進「哲學」這樣的議題上，明治 10-30 年代就是一段不得不重視的時期。

假設將此問題由方法論層次思考的話，便能發現過往主導明治時期思想的研究之研究途徑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先專攻過西洋哲學相關領域而後轉到日本哲學史的學者們常採取的研究途徑。在此途徑中，學者們在研究某一位明治時代的思想家時，先將他的思想特色由其對西洋哲學的接受度或對某一個西方哲學的理解的程度來評估他的思想特色。另一種則是一開始就專攻日本思想史的研究者，通常重視明治思想家們的時代背景，尤其是他們個別如何與當時的社會互動這一點。

首先我們先來看西方哲學專攻的研究者對明治思想研究的途徑。採用此途徑的研究通常關注研究對象的思想家如何受到西方哲學的影響。因此，被敘述的思想之預期內容，與其說是此分析對象的思想本身，不如說是該思想家所接受的西方哲學的特色。問題在於採用此途徑的研究比較會忽略明治知識人在引進西方哲學之前就已經具有的各種傳統思想之角色。

到此無妨從日本學者重視的研究舉例。在青年時代曾經志於西方政治哲學研究的丸山真男（1914-1996）在 1942 年發表的福澤諭吉思想研究中，丸山以相當斷定的口氣主張「由於就像作為學問對象的儒教、在

其理路的精緻度以及其思想體系的整合之層次，根本無法與近代科學相提並論。（是故我們便）在此層面並不需要將之當作探討議題。」¹⁴眾所周知，丸山真男在對二十世紀後半德川思想研究帶來了壓倒性影響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展開的主要觀點是：儒家思想（根據丸山所說就是朱子學）的構造性特質經過江戶時代古學派的思索而遭到「解體」。¹⁵因此，就丸山的觀點來看，明治時代之後的儒學只能擁有最後需要被克服的「視座構造」（丸山語）方式而來發揮其思想功能。¹⁶

我們再從近年的研究中舉一個例子。附上「在明治時期以來日本人思考什麼問題，將之如何思考？」的副題之濱田恂子的《近・現代日本哲學思想史》（2006年）也主張：「在明治時代的初期，儒學已經喪失說服力，不能再是對人民的精神支柱」。在這樣的主張中，濱田所理解的儒學思想在明治時期引進西方思想的過程中幾乎完全沒有發揮其思想功能。¹⁷

接著我們來看主要由日本思想史本身為專門研究的學者所提出，有關明治時期思想的方法上問題。雖然在這裡並不贅述個案，於此途徑分類的學者常常以明治時期的政治・社會事件的情形和其研究對象的人物之出生背景、階級、政治社會上的立場等，看作這些人物思想展開的主要立足點，將這些思想家對此環境因素如何回應的態度和過程描述為此人物的思想特色。¹⁸筆者理所當然並不反對在研究江戶時代和明治時代的思想時重視其歷史背景本身。不過在二十世紀後半由此所分類的「日

¹⁴ 丸山真男（2001）。

¹⁵ 丸山真男（1952）。

¹⁶ 丸山真男（2001：8）。作為與此類似的例子，高坂史朗也以舉「西周」從西方學術體系引進「歸納法」推論方式為例，主張明治思想就離開了儒學的推理方式。請參見高坂史朗（2003）。

¹⁷ 濱田恂子（2006：46）。

¹⁸ 譬如，以中村春作的相關論述為例，雖然中村要探討的問題是明治時期的「儒教表象」的問題，但其分析主軸始終針對明治維新以來的「國民」國家形成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潮流。請參見中村春作（2003）。另外，耐人尋味地，由原來專攻西方哲學的岩崎允胤（2002）藉由非常長的篇幅說明從德川末期到明治時代的歷史背景。

本思想史研究途徑」的明治思想研究之多數在過度重視所謂其「時代背景」之餘，結果與如上所述第一種研究途徑一樣，並沒有充分注意到從儒家世界觀來對世界萬象觀察的方式、價值觀以及展開探討和論辯的方式等層次上針對明治時期知識人的治學上發揮了巨大的影響這一點。¹⁹

不瞞而言，倘若我們只點出如上研究途徑的問題，而沒有提及在日本思想的研究者內部也對這樣研究途徑的批判，就無法保持公平的態度。首先值得介紹的是，在 1970 年代渡邊和靖《明治思想史——儒教的傳統與近代認識論》所提出的觀點。渡邊的研究可以說是全面探討明治知識人在西方哲學引進過程中的儒家思想之作用。渡邊指出，在明治的知識人們對引進儒學思想，或將之內化的程度因他們的世代而異。而且在世代之間對儒家思想的接受度之差別反倒是將他們引進西方哲學之際在儒學和西方哲學之間思想張力上的差異而呈現。²⁰在近年，井上克人也參考如上渡邊的研究，強調存在於明治哲學深層的「宋學禁欲主義」之重要。²¹另外，當今愛爾蘭任教的澳洲學者白貴理（Kiri Paramore）最近的研究中也指出，在儒教中原有的普遍主義、平等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因素讓明治時代的知識分子能夠引進在西方思想中與此類似的思想部分。²²只是井上的研究也好，白貴理的研究也好，就他們所界定的「儒教的要素」之說明而言，其內容只不過是明治時代以前的儒家思想內容，並沒有從此進一步闡述在明治時代儒家思想本身具有的動態。其實，在

¹⁹ 在近年的相關研究中，有些學者開始主張日本的近代化過程反而加強了日本社會中的一些儒學特質。關於這一點，關注宋理學的思維構造的小倉紀藏即指出：「到明治時期之後『朱子學思維』才真正浸透於日本社會，而以佔「理」的頂點的天皇為中心的日本近代思想架構由此完成。」請參閱小倉紀藏（2012）。

²⁰ 渡邊和靖（1978）。在近年的相關研究中，山村獎的著作將與此類似的情況看作明治時期陽明學的嬗變。請參閱山村獎（2019）。

²¹ 井上克人（2011）。

²² Paramore（2016）。

近年的相關研究中，松野智章和石井剛的研究都意識到在東亞近代化的過程當中產生了「傳統漢學」轉換成「哲學」的情形。只是松野的研究主要考察的問題是「日本哲學」和哲學學科制度的整備，因此尚未有儒家思想經過西方哲學的引進而產生如「中國哲學」或「東洋哲學」般新的學術領域產生之觀點。²³同樣地，石井的研究之主要探討對象是從清末到民國時期初年的中國知識分子，因此他的分析並不包含在明治三十年之前日本漢學正在轉換到（中國）哲學的具體情形。²⁴

總而言之，如下所述，明治時期的儒家思想或經學思想，應該並沒有如丸山所說的「並不需要當作探討議題」，也不是如濱田所說的「已喪失說服力」。反之，儒家思想應該獲得了明治知識分子的認識中具有統合「近代科學」諸領域的功能之「哲學」這樣全新的學術方法，並藉由轉換成「中國哲學」和「東洋哲學」的學術領域而復甦。

參、作為形成「東洋哲學」學問領域形成的 「磁石場」之東京大學

那麼，我們所稱的「中國哲學」或「東洋哲學」的學術領域在明治時代知識分子的西方哲學引進之過程當中，在他們的心理中產生了何種思考上的動態變化而形成呢？我們不妨先關注產生此動態的主要時期和場所。將之作為具體歷史現場來描述的話，這應該是以在明治 20 年代（即 1880-90 年代）前後二十年為主要時段的東京大學誕生時期以及後續的帝國大學時期。關於明治初期東京大學創立的經緯以及其初期文學部之

²³ 請參閱松野智章（2017）。

²⁴ 石井剛（2014：25-42）。

制度和人事上的變遷過程已有不少研究，在此並不贅述。²⁵筆者所關注的地方並不在於創立時期的東京大學的所謂「中國哲學」領域周邊的制度和人事之動態，而是在思考我們所稱為「中國哲學」相關的講義和著述中的主要授課內容，以及其思想意義。

按照筆者的理解，為了思考「中國哲學」學術領域誕生和其發展，成為其主要契機的又如下四點事實：第一、美國人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 1853-1908）在東京大學所開設的「哲學」或「社會學」（從 1882 年 12 月到 1883 年 10 月）中的「中國哲學的發展」相關的上課內容。第二、在東京大學創立時期的「綜理」（校長）加藤弘之（1836-1916）任用在 1780 年（明治 13 年）東京大學哲學科第一屆「哲學專攻」畢業的井上哲次郎，並讓他編輯「東洋哲學史」相關的著作。第三、井上哲次郎則根據其學習成果，從 1882 年冬天到 1883 年秋天開設的「東洋哲學史」課程。²⁶第四、其實，除了如上三位之外，還有屬他們的學生世代的井上圓了和瀧川龜太郎（1865-1946）兩人。他們兩位在明治 10 年代均為東京大學的學生，而在其思想形成期（從在學時期到畢業不久的幾年之之間）藉由出版了不少學術論文和專書推動了「東洋哲學」研究領域的實際發展成為實際推動。本文以下以費諾羅薩、井上哲次郎、島田重禮三位為中心探討他們對東京大學創立時期為「中國

²⁵ 笠松和也（2019）一文非常仔細地勾勒出東京大學從創立時期到第二大戰時期的制度、人事動態、研究內容（特別其與《哲學雜誌》的關係）之演變。此文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收藏的《「2014-2018」年度多分野交流演習「東京大學草創期の授業再現」報告集》。東京大學哲學研究室的網頁也提供該部分的電子檔，參見其「研究成果報告」網頁（<http://www.l.u-tokyo.ac.jp/philosophy/seika.html>）。

²⁶ 只是如下所述，在費諾羅薩和哲次郎之後，也有以與前面兩位不同的角度講授「東洋哲學」內容的島田重禮（1838-1898）等人。其實，井上哲次郎雖然在 1882 年（明治 15 年）3 月就任東京大學的助教授，但在 1884 年（明治 17 年）年便前往德國出發，直到 1890 年才回國。

哲學」學術領域形成所發揮的思想角色。為此探討我們也關注三位在他們闡述「東方思想」的內容中，所謂「哲學」的觀點所發揮的角色。

眾所周知，東京大學在 1877 年（明治 10 年）設立，並從第二年（即 1878 年）開始將文學部分成「哲學史學政治學科」和「和漢文學科」。雖然我們可以確認在「哲學史學政治學科」的課程中「哲學」是必修科目，但是關於其教授課程內容是否含有我們現在稱為「中國哲學」這樣的內容則尚未釐清。只是在 1883 年（明治 16）度「東京大學法理文三學部一覽」中有記載，當時的東京大學開始將「中國哲學」的內容教授給學生的事實。其相關敘述如下：

「哲學」可分成「東洋」和「西洋」的兩種……若論及東洋哲學的沿革，其至要的領域是支那哲學和印度哲學的兩個主題。……由於在支那後世的哲學大概是基於秦漢帝國以前的哲學，課程應該從孔老孟莊楊墨等的學術開始。藉由論辨其是非和得失，或者論證其關係、傳統以及學派歸屬等問題。這是為了讓學生理解東洋一般的哲學之方法。²⁷

根據我們所蒐集到的紀錄，在此創始時期的東京大學，教授與中國古代哲學相關的課程有三門：（1）費諾羅薩在東京大學所開設的「哲學」或「社會學」（從 1882 年 12 月到 1883 年 10 月）中「中國哲學的發展」相關的上課內容。²⁸（2）東京大學哲學科第一屆畢業的井上哲次郎從 1882

²⁷ 原文為如下：哲學ハ分ケテ東洋及ビ西洋の二トス[……]東洋哲學ノ沿革ヲ論スルニハ支那哲學ト印度哲學トヲ以テ至要ナルモノトス。[……]支那後世ノ哲學ハ大抵秦漢帝國以上ノ哲學ニ本ツクヲ以テ先ツ孔老孟莊楊墨等ノ學學ヨリ始メ、或イハ其是非ヲ論ジ或ヒハ其得失ヲ辨シ或ヒハ其關係伝統及ビ流派等ヲ論証辨明シ、以テ暫時ニ東洋一般ノ哲學ヲ知ラシムルノ方ヲナスモノナリ。

²⁸ 假設將關於經書和諸子百家文獻的內容之科目都算入，應該也包含中村正直的相關科目。桑兵整理了有關中村正直所上過的課程之訊息。請參閱桑兵（2013：146-147）。

年冬天到 1883 年秋天所開設的「東洋哲學史」。(3) 島田重禮從 1885 年（明治 18 年）9 月到 1887 年春天教授的「支那哲學」。

接下來比較仔細地看他們三位的上課內容。第一位為費諾羅薩，如上所述，費諾羅薩從 1878 年（明治 11 年）8 月直到 1886 年（明治 19 年）7 月 30 日的八年期間，教授了哲學和哲學史、理財學（經濟學）、政治學、邏輯學等五門課程。於他在日本任職期間，費諾羅薩雖然沒有開設過有關專門講授以中國哲學為主題的課程，但在修課學生之一的井上圓了（1858-1919）紀錄了費諾羅薩講授「哲學」或「社會學」的課程筆記（應該是從 1882 年 12 月到 1883 年 10 月之間）中，還包含費諾羅薩針對「中國哲學的發展」議題講解的部分。²⁹雖然此講義內容分量本身並不多，但幸好其筆記內容仍保存至現在。費諾羅薩正在另一課程中曾毫無保留主張「If we can unite the doctrine of Spencer's Evolution & Hegel's Philosophy, we will have a complete philosophy.」。³⁰就堅信哲學和實際社會的發展都是在此兩者的密切影響之下而透過以辯證方式進行的費諾羅薩而言，中國古代哲學的展開也勢必經過「正—反—合」的辯證過程。在這樣的理論構想上，費諾羅薩進一步將戰國諸子的學派傾向歸納為三個學派。針對此三個學派，費諾羅薩並沒有使用具體的名稱來稱呼它們，只使用「第一」、「第二」以及「第三」這樣的名稱稱呼。根據他所說，「第一學派」以儒家哲學家為主，如孔子、孟子、荀子以及揚雄。「第二學派」則由老子、莊子、列子等道家和韓非子所組成。屬於「第三學派」的思想家則是楊朱和墨子。根據費諾羅薩所說，「第一學派」所追求的主體在於政治和倫理，而其原理為愛（「仁」）和正義（「義」）。「第

²⁹ 以上敘述根據井上圓了留下的費諾羅薩講課的筆記。柴田隆行和 Rainer Schulzer 提供此筆記內容的日文翻譯。請參閱柴田隆行著，Rainer Schulzer 譯（2010）。

³⁰ 杉原四郎（1973：192）。

二學派」則是對人間的事情俱有負面的看法，他們努力效法天地的攝理所呈現出的理性和法則（按：這應該為「道」的翻譯）。第三學派將如上彼此格格不入之兩學派的綜合。不過費諾羅薩所主張屬第三學派的楊朱和墨子之哲學傾向，其實並非簡單的綜合。他認為，楊朱在主張極端的利己主義是與第一學派和第二學派不同的。其實，在思想發展的階段上，另外也屬於第三學派的墨家則是將楊朱的利己主義和第一學派的利他主義之進一步的綜合。正如墨家無法綜合「利己」和「利他」兩種格格不入的原則，楊朱也沒有成功地建立克服其他學派的主張之「Epicurean」（享樂主義）原則。也因此，雖然此兩家的勢力一度盛行，但也馬上就沒落了。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費諾羅薩對墨家並沒有將其視為屬「利他主義」的思想家。

接著我們來看井上哲次郎（下文僅稱「哲次郎」）「東洋哲學史」授課的情形。哲次郎從 1882 年（明治 15 年）冬天至次年的 1883（明治 16 年）6 月夏天的學期，即在前往歐洲遊學（1884 年 2 月）的前一年曾經開設過「東洋哲學史」課程。這一門課可以說是由受到正式「哲學」學科訓練的人來教授「東洋哲學史」課程的第一次。而且其主題範圍雖然稱為「東洋」，但實際內容主要為中國（古代）哲學。關於此「東洋哲學史」課程的具體內容，迄今保留著兩筆手稿筆記。³¹根據此兩本筆記的記載內容，哲次郎將整段中國哲學的歷史分成五期，其中從東周到秦朝的「第二期」則是以「思辨」為特色的時期。關於此時期的思想活動，哲次郎說，「孔子說仁；孟子說仁義性善；荀子說性惡；老莊說虛無恬澹；

³¹ 第一筆是由親自上過此門課的學生，如上所提及的井上圓了之親手筆記，而在其筆記本的封面有「東洋哲學史」、「井上哲次郎氏口述」、「井上圓了」等文字。其原本收藏於東洋大學・井上圓了研究中心。另一筆則是在金澤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的「高嶺三吉遺稿」中所包含的一本筆記。記錄者高嶺三吉（1861-1887）曾為東京大學文學部的選科生，但其於畢業之前病逝。針對高嶺對哲次郎「東洋哲學史」相當部分的記錄，由水野博太打成文字稿而出版。請參閱水野博太（2018）。

楊墨起一家之說……」。在列出戰國時期主要思想家的名字之後，哲次郎也思考將這些主張內容與那些西方哲學的內容可相對應。在此單元的最後，哲次郎再次將戰國主要諸子的主張整理為：孔子→利他主義；楊子→自利主義；墨子→兼愛主義；老莊→放任主義；申韓→干涉主義；管商→功利主義等六種。³²

在東京大學第三位講授中國（古代）哲學的學者是島田重禮。島田所受的教育在德川時代已經完成，而且在明治維新之後開設了自己的學堂而擔任老師。關於島田和東京大學的關係，島田從明治 12 年開始在大學文學部任教，並在 14 年升為教授。³³根據 1885 年至 1886 年（明治 18 年至 19 年）的文科大學年報之記載，島田對自己從 1885 年（明治 18 年）9 月到 1886 年春天教授「支那哲學」的課程提出如下的報告，即說：

針對專攻哲學的三年級學生，從本年開始，並不使用特定的書籍，而專以口述進行上課。首先舉「道德」、「仁義」等名義，並將之一一徵於經史文獻；也同時參考漢魏以來諸儒的學說來辨明其細節，以致從堯舜周孔到孔門諸弟子學派的源流，以及周末諸子學術異同的說明。關於其具體方法，先簡要地描述各人的履歷，其次說明其學術大意，或摘選其中重要句子而示之於黑板，以期理解其學術之要旨。³⁴

在次年度 1886-1887 年（明治 19-20 年）的報告，島田說：

³² 水野博太（2018：28-30）。

³³ 萩原善太郎（1893）。

³⁴ 原文為：「哲學三年生ニハ本年ヨリ書籍ヲ用キスシテ專ラ口授ヲ以テセリ。先ス道德仁義等ノ名義ヲ挙ゲー々經史ニ徵シ，傍ラ漢魏以來諸儒ノ說ヲ採リ委曲之ヲ辨明シ，畢テ後堯舜周孔ヨリ孔門諸弟子學派ノ源流并ニ周末諸子學術ノ異同ヲ演述セリ。其方先ス各人ノ履歷ヲ略舉シ，次ニ學術ノ大意ヲ說キ，或イハ書中ノ語ヲ摘テ之ヲ黑板ニ書シ，人ヲシテ其要旨ニ在ル所ヲ知ラシメタリ。」請參閱東京大學史史料研究會（1994：120-121）。

針對哲學科三年級學生，從前一年開始繼續口述支那哲學之大意。本課程先整理從周末諸子到兩漢學術的概略，並且辨明從魏晉南北朝，經過隋唐及至明清的諸儒學術之源流以及其內容的異同。本課程直到（明治）二十年六月完成而結束。³⁵

其實，島田是接著井上哲次郎離開東京之後的兩年：即在 1883-1884 年（明治 16-17 年）以及在 1884-1885 年（明治 17-18 年）的兩個年度，個別以「哲學」和「東洋哲學」的科目名稱，開始實際上為「支那哲學」的課程。雖然在 1883-1884 年的課程內容尚未清楚，但在 1884-1885 年度所講授的內容則是關於《莊子》。³⁶因此，島田在上引述的 1885-1886 年的年報中所提及的「並不使用書籍」的意思應該就是他並不按照特定諸子百家等文本內容來闡述課程內容。而在 1885-1886 年的課程則開始按照井上哲次郎於 1882-1883 年教授過的方式，透過整整兩個學年來講授中國哲學通史。若考慮到哲次郎的「東洋哲學史」只講到西漢末年的揚雄的部分，島田在 1886-1887 的報告中則明確說明其講課內容「至明清」，並且他也表示「完成了課程」。根據在報告中島田所說明的情形來看，島田對「支那哲學」的課程有從 1885-1887 年兩個學年的安排，我們獲悉島田在 1885 年秋天的課程，先講述「仁」、「義」、「忠信」、「孝悌」等中國哲學的主要德目，而從 1886 年 2 月 10 日開始講解戰國諸子百家，進入 1887 年後繼續講解漢代思想，而到同年 6 月講及清代的思想。³⁷換言之，島田花兩個學年的時間上過「中國哲學通史」一門。

³⁵ 原文為：「哲學科第三年生ニハ前年ヨリ引續タル支那哲學ノ大意ヲ口授セリ。先ス周末諸子ヨリ兩漢學術ノ概略，并ニ魏晉南北朝隋唐ヲ經テ明清ニ至ルマテ，諸儒學流ノ源委異同ヲ辨明ス。二十年六月課程ヲ完了セリ。」請參閱東京大學史史料研究會（1994：504）。

³⁶ 三浦節夫（2016：97）。

³⁷ 如上所提的金澤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的「高嶺三吉遺稿」也包含此島田重禮的「東洋哲學史」筆記。但高嶺的筆記本身以在 1886 年 5 月 13 日「宋代儒學：張載」為最後一堂，與島田的

總之，雖然島田的課程並不完全由受到「哲學學科」訓練的教師來講授的內容，但這是當時在東亞近代高等教育機構中第一次在附上「……的哲學」的課名中提供從古代到近代的中國哲學史之通史內容的課程。

以上是說明在東京大學的創立時期——即 1882-1887 年（明治 15-20 年）前後——在現在稱為「中國哲學」相關的上課內容。在明治時期中國哲學研究領域的形成過程中，除了授課者的費諾羅薩、井上哲次郎、島田重禮三人之外，還有一位極為重要的人物。他就是上過如上三位的課程的井上圓了（1858-1919）。根據筆者所知悉，井上圓了是在東亞知識分子中，在受過「哲學」這一門的學術訓練之後，撰寫且發表關於中國哲學／倫理相關著作（並非西方著作之日文翻譯）的第一位人物。井上圓了針對「中國哲學」相關問題而撰寫的文章個別在他的《哲學要領》（1886 年；明治 20 年）中「第三段：支那哲學」部分；《倫理通論》（1886 年；明治 20 年）中「第 1 篇第 16 章、第 17 章：中國古代の倫理」部分以及在《純正哲學講義》（1892-1893 年；明治 25-26 年）中「支那哲學」的相關論述中可以分別看到。不可諱言，井上圓了的中國哲學史之說明基本上是在 Fenollosa 和井上哲次郎的觀點之影響下所寫出來的。不過，我們再進一步詳細看圓了的相關論述便能發現：井上哲次郎對中國哲學的說明往往只不過於指出中、西方相關論述上彼此之間類比而已。同樣地，島田重禮的說明也還是主要以傳統的學案方式敘述文獻內容。相形之下，圓了對中國哲學說明之主軸在於借用「哲學」的觀點來試圖用心說明在各個中國哲學家之間的具體差別，如在「儒家」（孔子）哲學和「道家」（老子）哲學之間的異同等。不但如此，圓了在說明中國哲學展開過

報告內容並不符。水野推測理由說：當時高嶺的病勢開始嚴重（他同年 9 月去世），無法再出席的情形。參見水野博太（2018：28-30）。

程還借用從費諾羅薩學過的「辯證法」理論框架。而且其發展過程的具體說明不像費諾羅薩所說的那樣勉強。換言之，圓了針對「中國哲學」相關的論述，可以說是相當於將費諾羅薩、井上哲次郎、島田重禮三位的觀點綜合起來並加以體系性的理解。

其實，與圓了發表如上著作的同一時期，還有兩位東京大學畢業的學者，與圓了一樣推行針對中國哲學相關題目的著作和授課。第一位是在意識到「哲學」問題而發表不少有關先秦諸子的思想內容之瀧川龜太郎(1865-1946)。³⁸第二位則是以「講義錄」的形式，也意識到哲學觀點，而展開老莊思想的特色相關「講義錄」論述之內田周平(1854-1944)。不過，就當時我們所界定所謂「中國哲學」相關領域上撰寫具備最高理論性的論述，也是最為成功地將之理解為哲學史的應該還是井上圓了。³⁹

肆、由「哲學」視野之儒學理解的推進和落實

那麼，明治時期「哲學」這樣的學術訓練或者這樣學術體系的引進，對於「中國哲學」或「東洋哲學」轉換成以何種探求內容為核心的學術領域呢？在此我們探討明治知識分子以「哲學」這樣的分析工具具體如何試圖理解傳統思想的內容呢？按照筆者的理解，當時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最初注目的主要議題似乎有兩項。第一個是「性」概念。東亞思想傳統中，「性」這樣概念的重要性可以觀察出其字構成朱子學的代名詞（＝性理學）這一點。到了明治時期隨著「philosophy」概念的引進，在

³⁸ 譬如，瀧川對荀子的論述旨在於闡明荀子之哲學。請看瀧川龜太郎(1889)。關於明治知識分子對《荀子》研究的哲學「視野化」，請參閱佐藤將之(2006)。

³⁹ 關於內田的《老莊學講義》的出版情形，胡穎芝指出：「根據鄙見，《老莊學講義》保存著在1888年(明治21年)出版的版本和1894年(明治27年)年版之兩種。該書的份量大約總共四十頁左右，而提供給第一年級學生的上課講義。」參見胡穎芝(2021:184)。

當時無論是啟蒙知識人或傳統漢學家，他們都在「性」這樣的詞彙觀察出會與「哲學」有著一些思想關聯的可能性。在啟蒙知識分子中，早在西村茂樹（1828-1902）⁴⁰、接著到了明治 20 年代陽明學者的三島毅（1831-1919）⁴¹以及從歐洲回來之後的井上哲次郎等人⁴²，部分新舊世代的明治思想家們開始關注「性」概念。也隨著與引進「ethics」學科而形成的「倫理學」形成之潮流合流，「仁」、「義」、「禮」、「智」、「孝」、「忠」、「誠」等儒學「德目」也漸漸成為屬於「支那哲學」核心的價值之「倫理觀念」，由此得以重新定義。⁴³

第二種情形則是當時關於「孔子」各種論述的展開。不可諱言，德川時代的「官學」為儒學，位在江戶城北邊（現在御茶水火車站附近）的湯島聖堂（＝昌平坂學問所）定期由幕府主辦「釋奠」，也就是向孔子的祭祀。簡言之，在德川時代，孔子是德川幕府所推崇的聖人。經過明治維新後「釋奠」遭到廢止，在湯島聖堂的「遺址」上，文部省、高等師範學校、御茶水女子大學等機關設在其土地和建築物。然而這樣狀況並不代表明治時期的官僚和知識份子不去崇拜孔子。其實，後來由於嘉納治五郎（1860-1938）等人士的努力，湯島聖堂的「釋奠」在 1907 年（明治 40 年）隆重再登場。不但如此，像井上圓了的例子，他從 1885 年（明治 18 年）起開始祭孔的活動。從這些事實所可以觀察到的是，從

⁴⁰ 西村茂樹（1880：5-15）。

⁴¹ 三島毅（1894）。

⁴² 關於哲次郎對中國哲學史上「性論」展開的見解，在 1889 年 Stockholm 召開的「萬國東洋學會」以“Die Streitfrag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en über die menschliche Natur”的主題講演，在回國後翻譯而從《哲學會雜誌》出版。請參見井上哲次郎（1891）。該文論文也收入於氏著，島藺進、磯前順一編（2003）。

⁴³ 也可以參考李惠儀（Wai-ye Li）的如下觀察：「與西方哲學邂逅同時促進界定真正像『中國』的定義」，請參見 Li（2019）。

明治中期到大正時期的日本社會對孔子的關注實為並不亞於江戶時代湯島聖堂所舉行的祭孔。

還有一件值得提及的情況是，在整段明治時期之間，明治知識分子不分新、舊世代都發表了大量有關孔子的各種言論之事實。⁴⁴由於明治時期出現有關孔子的言論其規模之龐大，其主題和內容也很多樣，針對其實際情況，筆者只好找另一個機會專論。⁴⁵不過在此可以指出的是，在井上哲次郎於東京大學學習「哲學」之後，發表的文章就是關於當時西方學者的孔子論。在該文中哲次郎指出，當時西方「孔子論」的毛病就在於不是讚美就是批判，而其理解有點失去平衡。⁴⁶到此，我們可以注意到的一點，在哲次郎發表該文的 1882 年（明治 15 年）之時間點，哲次郎透過西方學者「孔子論」的視野，開始將「正確理解孔子」的問題設定為明治知識分子需要考察的主要議題。筆者認為這是在明治知識分子的思維中將孔子成為「哲學家」的第一步。在此之後，明治時期的知識分子藉由獲得「哲學」這樣的分析工具而主要從明治時代中期全面展開以「哲學」或「倫理學」為框架的「孔子研究」，將孔子的形象從德川時代的「經學的祖述者」之「儒學聖人」到實踐人類普遍的道德或倫理價值的「哲學家」來逐漸轉換。同時其身為中國哲學的創始者的角色被與西方哲學的蘇格拉底和印度哲學的釋迦摩尼相比。⁴⁷在此將成為孔子的「哲學家」化完成的契機是在 1904 年（明治 37 年）由蟹江義丸（1872-1904）撰寫的《孔子研究》之出版。⁴⁸就這樣，接在明治時期之

⁴⁴ 工藤卓司（2018）。

⁴⁵ 工藤卓司（2018）。

⁴⁶ 井上哲次郎（1882）；後收入於島藺進、磯前順一編（2003：1-9）。

⁴⁷ 在井上圓了的生涯思索歷程中，「儒學聖人」的孔子形象漸漸轉換成實踐普遍倫理價值的「哲學家」的孔子。請參見佐藤將之（2018）。

⁴⁸ 蟹江義丸（1904）的內容受到梁啟超（1873-1929）和王國維（1877-1927）等人的矚目，並且得以翻譯。當時青年的錢穆（1895-1990）透過此翻譯其內容受到很大的啟發。請參見工

後，如在大正時期和昭和初期之期間引導日本學術界和教育行政的服部宇之吉（1867-1939）、新渡戶稻造（1862-1933）等人在心中所尊崇的孔子應該已不再是所謂「經學聖人」的孔子，而是如井上圓了和蟹江義丸等人所描述的，是實踐人類普遍道德的「哲學家」孔子。

伍、結論

從「中國哲學」這樣的學術領域在明治時期的日本誕生。此過程的歷史意義並不只是在明治時期前半，離創立不久的東京大學由於所謂「哲學」學科的引進，使得當時專攻「漢學」和「東洋思想」等青年知識分子之間普及有關西洋哲學的知識，更是針對此學問的知識得以深化。而且當時年輕的教師和學生們藉以實際使用「哲學」這樣的分析工具，在中國古代經書和諸子百家文獻中重新找出某種普遍意義，重新構築新的論述而藉此促成了新的思潮形成。當時被稱呼為「支那哲學」或更為廣義地被界定為「東洋哲學」的中國哲學這樣的學門，在當時為了建設近代國家這樣的歷史、制度上的需要為背景，從此探討與東亞傳統思想價值相關的主題之學術框架，不但逐步落實於日本的教育制度中，其影響從清末到民國時期初期的中國啟蒙知識分子對自己文化和思想之重新認識的過程。

與此同時，我們還是不可忽略的當時情況是，在明治初期的東京大學以及其後相繼開設的明治中期之帝國大學受到哲學教育的知識分子中相當多數的人，由於從幼少年到青年時期，即在進入大學之前的階段已經受到相當徹底的漢學教育，其從漢學教育所獲得的價值觀，不僅對其大學在學當中，而且畢業之後很久仍成為著他們核心價值的來源。因此他們基本上一輩子都以他們的「經學價值觀的眼睛」將新知識過濾而取

捨。重要的一點是，就代表明治時期思想的知識分子之思維而言，他們對「哲學」的接受與其代表自動接受西洋的價值系統，不如說是由「哲學」的學習反而能加強他們思維中原來就有的漢學和經學的世界觀和價值觀。⁴⁹在此由哲學來不斷加強他們的傳統價值之過程當中，中國古代所謂「戰國諸子」的文獻內容也逐步以「……的哲學」的方式被稱呼。由此，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韓非子等名稱也從文獻的名稱轉換成「哲學家」的名稱。換言之，「戰國諸子」都成為了被視為是中國古代曾經存在的哲學家。

時代從明治末年到大正時期，在日本社會中「修身論・修養論」、「國民道德論」或「孔子教」⁵⁰等各種思想活動、潮流或意識形態陸續成形。過去研究的主流觀點將這些思潮看作日本德川思想的直接延續之展開型態。然而正如本文所論述，這些思潮並非從德川時代的漢學和經學直接發展或形成，而是經過明治時期以東京大學為磁力場，由受到「哲學」學科訓練的青年知識分子藉由此「哲學」的分析工具來反省漢學・經學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並將之主動轉換而重新建構出來的。

附記：本文是受到日本博報堂教育財團「第 14 回・日本文化研究部門」（2019 年 9 月～2020 年 8 月）贊助而進行的研究之部分成果。筆者對此表示衷心謝意。

⁴⁹ 白貴理 (Kiri Paramore) (2016) 在前揭書中的觀點可以說是藉由關注儒家思想這樣的層面來重新解讀日本近代儒教史的特色。

⁵⁰ 金培懿認為「孔子教」淵源在 1890 年(明治 23 年)發布的「教育勅語」。請參見金培懿(2019)。然而「教育勅語」沒有具體提及孔子其人。而且在如上文所述的明治・大正時期「孔子」論盛行的脈絡來思考，從明治時期到大正時期的日本，「祭孔」的復甦，與其說是當時的日本社會受到「勅語」的直接影響，不如像井上圓了的例子，明治知識知識分子對孔子本來就包著崇尊和親近的情感，而因為他們自己要以實際的場合來定期呈現，所以重建了「祭孔」這樣的行事。

參考文獻

一、筆記資料類和明治時期出版物（包含其彙集類）

大久保利謙編（1960）。《西周全集・卷1》。東京：宗高書房。

井上哲次郎（1882）。〈泰西人ノ孔子ヲ評スルヲ評ス〉，《東洋學藝雜誌》，4：53-56。

---（1891）。〈性善惡論〉，《哲學會雜誌》，47：621-632，48：683-699。

--- 述，井上圓了手稿（1882-1883）：《東洋哲學史》，東洋大學井上圓了研究中心所藏。

---（1933）。《明治哲學界の回顧：岩波講座哲學・卷10》。東京：岩波書店。

--- 著，島藺進、磯前順一編（2003）。《井上哲次郎集・第9卷》。東京：Kress 出版。

中江篤介（1886）。《理學鉤玄》。東京：集成社。

---（1901）。《一年有半》。東京：博文館。

西周（1874）。《百一新論》（山本覺馬藏版）。

西村茂樹（1894）。〈大學ノ中ニ聖學ノ一科ヲ設クベキ說〉，松平直亮（編），《西村茂樹先生論說集》，163-166。東京：修德園。

高嶺三吉（約1884-1887）。《高嶺三吉遺稿》。金澤：金澤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手稿。

萩原善太郎（1893）。〈文學博士島田重禮君小傳〉，萩原善太郎，《帝國博士列傳》，47-51。東京：敬業社。

東京大學史史料研究會（1994）。《東京大學年報・第五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三島毅（1894）。〈性の説〉，《東京學士會院雜誌》，16，1，1-29。

西村茂樹（1880）。〈性善説〉，《東京學士會院雜誌》，3，6，5-15。後收入於日本弘道會（編）（2008）。《西村茂樹全集・第2卷》（1976復刊版），67-72。京都：思文閣。

蟹江義丸（1904）。《孔子研究》。東京：金港堂。

二、現代著書（中文）

工藤卓司（2018）。〈明治中期的孔子研究〉，蔡長林（編），《林慶彰教授七秩華誕壽慶論文集》，395-434。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2020）。〈蟹江義丸與《孔子研究》〉，張曉生（編），《經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林慶彰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下冊》，1477-1522。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石百睿（2007）。〈早期現代東亞學術界裡的東西哲學交織與「中國哲學」的誕生〉，景海峰（編），《拾薪集：「中國哲學」建構的當代反思與未來前瞻》，131-14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金培懿（2019）。〈儒學之新生抑或變異——近代日本之孔子教運動〉，金培懿，《日本儒學之社會實踐》，257-314。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李慶（2010）。《日本漢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佐藤將之（2006）。〈漢學與哲學之邂逅：明治時期日本學者之《荀子》研究〉，《漢學研究集刊》，3：153-181。

---（2016）。〈日本學者追求「觀念史」研究的固有歷史脈絡與三個契機〉，《東亞觀念史集刊》，11：3-21。

---（2018）。〈成為「哲學家」的孔子、成為孔子的井上圓了：近代日本「孔子教」之淵源探析〉，《現代哲學》，2018，4：119-130。

徐水生（1993）。《中國古代哲學與日本近代文化》。臺北：文津出版社。

陳威璿(2017)。<〈中國哲學史通史寫作的發展——從中日交流的視角談起〉，鍾彩鈞(編)，《中國哲學史書寫的理論與實踐》，139-194。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陳瑋芬(2007)。<〈由東京大學「漢學」相關學科的建立和變遷看近代日本的學術轉型〉，景海峰(編)，《拾薪集：「中國哲學」建構的當代反思與未來前瞻》，117-13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桑兵(2010)。<〈近代「中國哲學」發源〉，《學術研究》，2010，11：1-11。

曹峰(2016)。<〈對內田周平的重新認識〉，《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3，2：75-99。

梅約翰(2007)。<〈明治學術資源、論理學與中國哲學的雛形〉，景海峰(編)，《拾薪集：「中國哲學」建構的當代反思與未來前瞻》，106-1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藤井倫明(2011)。<〈被遺忘的漢學者：近代日本崎門朱子學者內田周平學思探析〉，《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17：53-81。

三、現代著書(英文)

Li, Wai-yee (李惠儀) (2019). "Introduction", Wai-yee Li and Yuri Pines (eds.). *Keywords in Chinese Culture* (ix-xlv).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Paramore, Kiri (白貴理) (2016). *Japanese Confucianism: A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四、現代著書(日文)

三浦節夫(2016)。<《井上圓了：日本近代の先驅者の生涯と思想》。東京：教育評論社。

- 小倉紀藏（2012）。《朱子學化する日本近代》。東京：藤原書店。
- 山村獎（2019）。《近代日本と変容する陽明學》，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 丸山真男（1952）。《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2001）。〈福沢諭吉の儒教批判〉，丸山真男，《福沢諭吉の哲學》，7-35。
東京：岩波書店。
- 井上克人（2011）。《西田幾多郎と明治の精神》。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
- 中村春作（2003）。〈「國民」形象化と儒教表象〉，藤田正勝、卞崇道、高坂史朗（共編），《東アジアと哲學》，36-44。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
- 水野博太（2018）。〈「高嶺三吉遺稿」中の井上哲次郎「東洋哲學史」講義〉，
《東京大學文書館紀要》，36：20-49。
- （2020）。《大學と漢學——東京帝國大學とその前身校における漢學および「支那哲學」の展開について》。博士論文。東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
- 末岡宏（2019）。〈蟹江義丸について〉，《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70：65-85。
- 石井剛（2014）。《戴震と中國近代哲學：漢學から哲學へ》。東京：知泉書院。
- 吳鵬（2011）。《京都中國學派の論語研究》。博士論文。長崎：長崎大學生產科學研究科。
- 坂出祥伸（1994）。〈中國哲學研究の回顧と展望——通史を中心として〉，
坂出祥伸，《東西シノロジー事情》，17-94。東京：東方書店。
- 杉原四郎（1973）。〈フェノロサの東京大學講義：阪谷芳郎の筆記ノートを中心として〉，《季刊社会思想》，2，4：189-205。
- 李梁（1993）。《近代日本中國學におけるポリティックスとアカデミズム：服部宇之吉と近代中國學》。東京：富士ゼロックス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
- 赤塚忠（1968）。〈序論〉，赤塚忠（等編），《中國文化叢書2：思想概論》，1-30。東京：大修館書店。

岩崎允胤（2002）。《日本近代思想史序説上（明治前期篇）》。東京：新日本出版社。

松野智章（2014）。〈日本思想の近代化と哲学科：思想における共通言語としての哲學〉，松野智章等（編），《近代日本の大學と宗教》，137-167。東京：法藏館。

胡珍子（2015）。《狩野直喜の生涯・學術・思想——近代日本京都支那先驅者》。博士論文。大阪：關西大學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

胡穎芝（2021）。《漱石の「向う側」から晩年の「則天去私」へ：東洋思想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に》。博士論文。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學日本文學部。

徐水生（2008）。《近代日本の知識人と中國哲學》。東京：東方書店。

柴田隆行著，Rainer Schulzer 譯（2010）。〈井上圓了『稿録』の日本語譯〉，《井上圓了センター年報》，19：268-164。

桑兵著，村上衛譯（2013）。〈近代「中國哲學」の起源〉，狹間直樹、石川禎浩（共編），《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翻譯概念の展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現代中國研究センター研究報告》，143-166。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高坂史朗（2003）。〈儒學から哲學へ〉，藤田正勝、卞崇道、高坂史朗（共編），《東アジアと哲學》，207-224。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

笠松和也（2019）。〈戦前の東大哲学科と『哲學雑誌』〉，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多分野交流演習「東京大學草創期の授業再現」報告集》，1-40。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

渡邊和靖（1978）。《明治思想史：儒教的伝統と近代認識論》。東京：ペリカン社。

遠藤智夫（1993）。〈「哲學」の譯語考〉，《英學史研究》，1994，26：71-83。

末岡宏（2019）。〈蟹江義丸について〉，《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70：65-85。

濱田恂子（2006）。《近・現代日本哲學思想史：明治以來、日本人は何をどのように考えて来たか》。横濱：關東學院大學出版會。

瀧川龜太郎（1889）。〈荀子論〉，《東洋學會雜誌》，3，6：298-308；3，7：337-347。

ジョン・マラルド（John C. Maraldo）著，白井雅人譯（2014）。〈外國語の習得としての明治時代における日本への哲學の導入〉，《國際哲學研究》，3：7-13。